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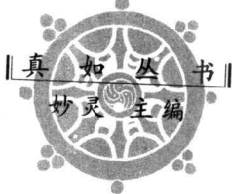


# 近现代中国佛教论

高振农佛学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真如丛书  
妙文主编

近现代中国佛教论

高振农佛学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现代中国佛教论: 高振农文集/高振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12

ISBN 7-5004-3494-4

I. 近… II. 高… III. ①高振农-文集②佛教-  
中国-近代-文集 IV. B9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3903 号

责任编辑 黄夏年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炳 图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2

字 数 256 千字

印 数 1—3500 册

定 价 22.5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 序

中国佛教从印度东传以来，在中华大地生根、发展，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至今绵延不绝。从东汉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译经与格义佛教，是中国佛教的初扬时期，其结果是以某一经论为核心而形成了部分学派；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宗派大成的阶段，华严、天台、禅宗等宗派的形成，表明了印度佛教在理论思想上的全部中国化。而宋元之际的佛教，又以禅、净为主流，进入佛教中国化的鼎盛时期，在民间发生了全面影响。到了明代，圆融的思潮已经成为佛教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

清末民初，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回归印度佛教的思潮，以欧阳竟无、太虚大师为代表。今天，世界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在呈现出多极化、全球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思想、文化、学术之中，多元文化互相渗透，既有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又有东西文化的辩论，中国文化面临着转型与重组。古老的佛教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继续传统、发扬光大，如何与时俱进，已经成为当今佛教界的最大课题。

历史早已说明，佛教的发展与弘扬，不可能超越于时代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济、学术之外。虽然 20 世纪的中国佛教曾经面临着西方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的巨大冲击，但是由于在一批高僧大德、檀那信众，以及社会人士的关心、支持和努力下，最终艰难地度过一个世纪，现在正在朝着健康的轨道上

运转。

佛教从来都是一个讲智慧的宗教，尤其重视智慧的解脱，在思想方面它曾经对中国文化作出巨大的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代高僧大德、学士文人都非常看重义理的建设，他们撰述著作、注释经论，佛教的义理之学才得以发扬光大。从历代僧传的体例来说，“义解”排在“译经”之后，“习禅”、“明律”之前，可见学术研究在中国佛教里所占的重要地位。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了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但是这一形式，又使佛法的“义解”与近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有了一定的差异。

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突显了佛教的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但是，佛法还有自己的宗教性与神圣性。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往往对佛法的理解上有其优越性。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所以，加强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合作，对于推动佛教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前些年佛教界一直忙着修复寺院、佛像开光、旅游接待，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同时，由于教界人才的凋零，青黄不接，兴办佛学院成为中国佛教的一条出路。如今，二十年过去，

人才紧缺仍然是佛教界的最大困惑。如何培养人才、引进人才，是佛教发展在组织、制度建设上的重要课题。佛教文化与文化的佛教是一回事，佛教文化需要现代化人才，文化的佛教也在呼唤人才的到来，佛教在社会的普及程度、观感，社会大众对佛教的理解水平，关系到佛教未来的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真如寺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恢复重建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至今仍然有许多建筑需要修建。我主持真如寺以后，在政府有关部门、四众弟子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有限的成果。但是，梵刹庄严，金像重光，只是一种外在的形象，佛教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是文化内涵。由于这一点，真如寺在经济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仍然非常重视文化建设，每周举办讲经活动、收藏名人书画、出版画册等等。

我于 1944 年出家，曾在上海佛学院读书，后来又在全国各大丛林参学。改革开放后，参与上海佛学院的工作，教书育人，一辈子都在从事着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在寺务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我仍然坚持每周为信徒讲经，有时还到国内外从事一些弘法活动，闲暇之时，自己也写一些东西，文字因缘初衷不改，爱好佛教文化从未改变。

这次，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有意组织一套佛教丛书出版，旨在推进佛教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我虽然已经年老，但是对于佛教文化之事，亦不敢推卸，只能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尽力促成此事。真如寺决定今后每年都将拿出一定的资金资助佛教研究的事业，帮助学者出版有关佛学著作，鼓励法师、学者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为的是将中国佛学推向世界。

本丛书的编辑方针是将佛教进行整体研究、契时而不过时，着重突出以下几个重点：

1. 原始资料的建设：包括藏外文献的整理，重要文献的校注，近现代佛教文献的整理出版。

2. 鼓励出版佛教研究的热点，同时加强资助目前中国佛教研究的薄弱点：如戒律、清规、礼仪等。

3. 南传佛教、藏传佛教。

4. 国外优秀佛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

发展佛教文化是一项长久的事业，需要巨大的恒心、愿心。真如寺一年资助四本书出版，数量虽不算多，但是如果长期坚持下来，经过十年、二十年乃至百年，亦可成洋洋大观矣！滴水归海而不失，佛教的发展正是由点滴事情作起。只要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四众弟子重视文化事业，专家、学者能够共襄盛事，佛教文化焉有不流传耶！

妙堂

2002年6月1日  
于上海真如寺方丈室

# 目 录

总序	( 1 )
佛学有缘 (代序)	( 1 )
中国佛学与近代哲学	( 5 )
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	( 23 )
关于佛教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 39 )
关于佛教在社会主义时期作用问题的探讨	( 57 )
西域佛教与江南佛教	( 73 )
上海佛教发展的特点	( 90 )
民国年间的上海佛学书局	( 108 )
《大乘起信论》简论	( 120 )
试论玄奘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复兴	( 137 )
试论唐代佛典翻译的特点	( 152 )
朱熹与佛学	( 168 )
《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	( 184 )
试论智者大师的“两风”建设和理论特色	( 197 )
欧阳竟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所必需》评述	( 211 )
试论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佛学思想	( 219 )
论章太炎佛学思想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 234 )
梁启超的佛学思想	( 246 )
试论熊十力对印度佛学思想的批判与改造	( 260 )
梁漱溟的佛学思想	( 269 )



---

吕澂对汉文大藏经的研究·····	(280)
浅谈吕澂对玄奘翻译的评价·····	(293)
怀念恩师吕澂先生·····	(297)
台湾佛教与我国大陆佛教密切相联·····	(303)
后记·····	(320)

## 佛学有缘

暇时与友人闲谈，我常常讲，我是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同步成长的。这是因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于1958年，当时我是该院政法专业的学生。1959年成为社科院成立后的第一届毕业生。40年来，社科院从经济、历史、哲学、法律等少数几个研究所，不断发展到今天有数十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成为全国省、市级最大的社科院。而我也从一个不很懂事的农家孩子，在大学毕业毕业后，一步步由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到研究员。正是由于我是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同步成长的，所以我对社会科学院有着一一种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既深刻又诚挚的感情。

社科院成立40年来，我一直在社科院工作，始终未离开过。因此，社科院是培养我成长的地方，也是将我的一生奉献给佛学研究事业的地方。在这40年中，值得我回忆的事情实在太多。使我终身难忘的有三件。正是这三件事，决定了我以佛学研究为事业的一生，并在这一领域里取得了一些成就。

第一件事：毕业后留院进哲学所当研究生。

在毕业分配的大会上，宣布我留院进新建立的哲学研究所举办的哲学研究班学习。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院党委办公室主任李润玉同志召集我们留院的数十名毕业生开了一个会。他在会上说你们几十位同学，是从全院数百名毕业生中挑选后留下的，今后要进各种研究班学习。从现在起，你们已跨进了研究机构的大门，因为你们将来都要搞社会科学研究的，都要当研究员。当时

我们还不知什么叫社会科学研究和怎样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但是，我们都已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高尚的事业，而且是我们终生的事业。从此，我到了新建立的哲学研究所，当时的所长是由院党委书记李培南同志兼任的，副所长是著名哲学家冯契同志。我在该所主办的哲学研究班，随冯契教授学习哲学，主攻中国哲学史。其时，我悉废原来所学，专心投身于中国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由于我勤奋好学，有钻研精神，深得冯契教授的重视。这为我后来长期追随在冯契同志身边，参加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等的编写，结成了长达15年之久的深厚师生友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件事：社科院决定派我到南京随佛学专家吕澂学佛学。

我在哲学研究所，追随冯契教授，先是学习，后是搞点研究，主要是搜集资料，前后近两年。1961年的一天，正副所长一起找我谈话，说是决定派我到南京随佛学专家吕澂先生学佛学。李培南同志对我谈起了南京佛学研究班建立的由来。他说：不久前去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议，与吕澂先生同住一个房间，偶然谈起佛学研究后继无人，最好办一个佛学研究班。吕澂先生想带几名研究生。李培南同志非常热心这件事，当即向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负责人之一潘梓年同志作了汇报，得到全力支持。决定由哲学社会科学部委托吕澂先生在南京办一个为期5年的佛学研究班。李培南同志最后说，上海社科院决定派你去。冯契同志则对我说，佛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懂得佛学，就写不好中国哲学史，派你去学习佛学，就是希望你将来能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有所成就。说老实话，当时我对佛学一无所知。所以当听到要派我去南京学佛学，我内心是非常震惊的。但是，听党的话，服从组织上的安排，是我们一代大学毕业生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以我还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从此以后，我和同学张春波（来自北京哲学研究所）、杜

继文（来自内蒙古大学）3人在南京师从吕澂先生学习了5年佛学，直到1965年年底才回到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正是由于这一因缘，才使我毕生以佛学研究为职责，并在佛学研究领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第三件事：社科院恢复后重返研究岗位进入新建的宗教所。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地，上海社科院被看成是修正主义的基地而被“砸烂”，我也被称为“红色和尚”而受到批判，从此“高和尚”的绰号传遍了社科院。我先是在奉贤“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后来被安置在社科院惟一保留的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每天踏黄鱼车往返于万航渡路1575号至淮海路622弄7号之间，为当时的“干校六连”写作班子人员送书，前后长达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社科院恢复，李培南同志仍任院党委书记。一天，李培南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归队，仍回哲学所搞佛学研究。一开始我确实举棋不定，“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的余悸仍在。我当时已经53岁，一些好心的同事劝我说：你年纪已经不小了，等到你把早已荒废掉的佛学专业知识重新拾起来，再搞佛学研究，恐怕已到退休年龄了，还不如待在图书馆好些。而当时图书馆的领导也极力挽留我，不想让我离开。我思之再三，回到家同老伴商量又商量。当时我想到，我29岁进大学，毕业后又学习哲学、佛学，前后是“十年寒窗”，结果一事无成，国家白白培养了我10年，我自己也白白地勤学苦读了10年，实在是有点不甘心。于是我终于下定决心，重返研究岗位，从事佛学研究。现在看来，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我后来在佛学研究方面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完全来自于当时的这一决定。1979年初，我回到了社科院哲学研究所。1981年宗教研究所成立，我又被调往该所，专门从事佛学研究。重返研究岗位后，为了追回被失去的时间，我确实是埋头苦干、发奋图强、顽强拼搏的。有一段时间，社科院科研处的同志称我是“多

产作家”，是科研中的“快手”。殊不知我的每一项成就，都来自于苦干加拼命。十多年来，我可以说是从来没有星期天和国定节假日的，每晚不到11点不休息，天天如此，年年如此。那时候，老伴常和我开玩笑地说：看你忙的，现在想和你说说话、聊聊天的时间都没有了，每天只能在饭桌上和你说几句话。事实上确实如此。

我是1979年2月重返科研岗位的，到1992年12月我退休时止，前后十余年，除了主编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上海宗教史》（曾获社科院著作特等奖）外，还撰著了《中国佛教》、《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大乘起信论校释》、《中国近现代高僧与佛学名人小传》、《静安古寺》、《龙华寺》、《中国近代哲学史史料学简编》，编辑了《佛藏要籍选刊》14册等。又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特约编辑，参加该书佛教部分的编辑工作。还参加冯契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专著的编写；担任《中国哲学史词典》编委，编纂有关宗教史条目；参加罗竹风主编的《宗教通史简编》和《宗教经籍选编》中有关佛教部分的编写。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佛学论文约60余篇。著作和论文加起来，约有160万字左右。而我自己也由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而到研究员。

总起来说，我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同步成长。而以上所举的三件事，则是我逐步成长的三个关键。值此建院40周年之际，谈谈以上的这些感想，作为向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献礼。

# 中国佛学与近代哲学

中国近代，是一个伟大的哲学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哲学革命进程的主要特点是“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并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思想进行批判继承，正确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因此，中国近代哲学，既受到西方近代哲学的影响，又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带有自己的民族特点。

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多有成就的思想家，大多不是专搞哲学的。他们研究哲学，主要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去寻找思想武器。而中国佛学，原本是一种从印度传来的外来思想，但在中国流传过程中，不断和中国的传统思想相融合，逐渐演变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学思想，内容丰富，理论周密，分析方法精致，对近代的一些思想家、革命家和哲学家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中国佛学与近代哲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 中国佛学在近代的复兴及其原因

### （一）近代佛学的复兴

佛学自印度传来中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弘传，隋唐时发展到了极盛，形成了各个不同的宗派。宋明以后则逐渐趋向

衰落，原来佛学思想较丰富的法相宗，简直被人遗忘了。但到了近代却又出现新的转机，呈现出复兴的迹象。反映这一时期佛学复兴状况的主要标志是：

(1) 佛教文化的迅速发展。佛教文化的发展，包括刻经处的建立，佛学院的创办和佛学刊物的发行。刻经处是近代编校、刻印、流通佛典的佛教文化机构。创始较早、贡献较大的为杨仁山居士在南京所创的金陵刻经处。在金陵刻经处的影响下，长沙、北京、天津、重庆、常州、苏州、杭州、宁波、广州、福州等地，也陆续成立了刻经处或佛经流通处，刻经事业遍及全国各地。此外，上海佛教界于1929年成立了佛学书局，用铅字排印各种佛教名著出版，流通佛教经典、图书、法器和文物等。大藏经的刻印事业也先后兴起。我国第一部用铅字印刷的大藏经《频伽藏》于1909年印行流通；日本《卍字续藏》也于1923年影印流通；1931年又影印了《磔砂藏》（并附印《宋藏遗珍》）流通。1943年在上海建立的上海普慧大藏经会，也刻印大藏经。而南京支那内学院则编印了《藏要》三辑。所有这些佛教经典的刻印流通，都为近代佛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佛学院是近代培育僧伽和佛学人才的专门学校。戊戌政变后，各地陆续办起了不少僧学堂。先有湘僧笠云于1903年在长沙开福寺创办湖南僧学堂为嚆矢。继有文希（号亚髡）于扬州天宁寺设立普遍僧学堂，月霞和谛闲在南京三藏殿举办江苏僧师范学堂。1907年，杨仁山又在金陵刻经处创办祇洹精舍（又名“梵文学堂”）。随之而起的各种类型的佛学院，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在上海、杭州、常熟等地连续举办的华严大学，宁波的观宗学社（后改名弘法研究社），武昌的武昌佛学院，南京的支那内学院，厦门的闽南佛学院，北平的三时学会，四川重庆的汉藏教理院等。这些佛学院，为各地培养了一大批僧伽和佛学研究人才。

佛学刊物指宣扬佛教思想、研讨佛学义理的报章杂志。在近代，佛学刊物遍及全国各地，不下数百种。其中有日报、周刊、旬刊、半月刊，也有月刊、季刊和年刊。创办最早的为1912年在上海创刊的《佛学丛报》和1913年在上海发行的《佛教月报》。办刊时间最长的是在杭州创刊的《海潮音》月刊。学术价值最高的要推1923年起出版的南京支那内学院院刊《内学》。此外，主要的佛学刊物尚有：上海的《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威音月刊》、《佛学半月刊》、《觉有情》、《弘化月刊》、《觉讯月刊》，宁波的《弘法社刊》，汉口的《正信》，北平的《微妙声》，镇江焦山的《中流月刊》等。这些佛学刊物的发行，对近代佛学的复兴，起到了鼓动与宣传的作用。

(2) 汉藏佛学的沟通和中外佛学的交流。从来汉地研究佛学，仅依汉译佛典。近代以来，一些佛教学者逐渐感到不足，开始重视对西藏佛学的介绍和藏文经典的研究，出版了一些有关的著作。其中专门介绍西藏佛教和佛学的著作有李翊灼的《西藏佛教史》，芝峰的《西藏传教》，恩觉的《西藏佛教源流考》，吕澂的《西藏佛学原论》等。有关西藏佛教研究的论文就更多。同时，各地还建立起一批学习和研究西藏佛学的机构，其中著名的有支那内学院、汉藏教理院、藏文学院和四川近慈寺译经院。1922年在南京创立的支那内学院是讲学、刻经并重的机构。其学风一改过去仅就汉译佛典进行研究的做法，倡导利用梵、藏、巴（巴利文）等各种文字的藏经资料，校勘汉译经论，考订辨伪，进行研究，做到了“冶梵、巴、汉、藏于一炉”，为近代佛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和领域，在学术上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其他如四川的汉藏教理院，北平的藏文学院，都在培养藏传佛教人才、交流汉藏佛学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就。四川近慈寺译经院以刻印藏、蒙文经典为主。同时培养了一批译经人才。所刻藏、蒙文经论，丰富了近代佛教思想的宝库，沟通了汉藏佛学。



近代以来，佛教界也受到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他们效法六朝时代高僧求法精神，积极鼓励青年僧人出国考察和学习各国佛学，其中以东渡日本求法者最多。从1922年起，至抗日战争爆发，先后有五六批僧人前往日本。这些留日学僧回国后，除传授密法外，还传译日本佛学名著，介绍日本佛学研究方法，整理佛教文献资料，对中国佛学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先后前往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暹罗（今泰国）、缅甸等国留学的，也不下数十人。他们回国后，都对交流中外佛学思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3) 唯识思想的流行。唯识思想是佛教用以说明宇宙万有的一种学说。它主张外境非有，内识非无，以“唯识无境”为基本理论，是一种典型的宗教唯心主义。这一思想，渊源于印度的无著、世亲一系的瑜伽行派。自唐代玄奘糅译《成唯识论》后，其门下竞相传习，唯识学在唐初风靡一时。但到中唐即渐呈衰相，晚唐至宋，研究者已希，元代近于绝响。明代虽还有人传习，终因典籍散失殆尽，难得要领。直至近代，有杨仁山居士从日本找回古代遗集唯识、因明等大疏，刻印流通，法相唯识学的典籍才得以广传各地，从而为唯识思想的流行奠定了基础。此后，法相唯识学的研究逐渐形成热潮，不仅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三时学会等佛教教育机构均聚众讲唯识，而且在一些有名的文科科大学里也开讲唯识学。一时间有关介绍和讨论唯识学的著述和论文，遍及全国各地的佛学刊物和其他有关报刊，并有一批专著问世。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太虚的《新的唯识论》，朱宝昌的《唯识新解》，谬凤林的《唯识今释》，唐大圆的《唯识的科学方法》等。其中，对唯识学说作全面、系统研究的，要推欧阳竟无和太虚。欧阳竟无的《唯识抉择谈》和太虚的《佛学总抉择谈》，都是阐扬唯识学的纲领性著作，却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针对欧阳提出的“法相唯识为两种学”的观点，太虚陆续发表了